

社会转型期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 以社区建设为视角

殷树凤

摘 要: 目前,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影响到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社会改革的建议和构想,无论是突出一种排斥国家权力的纯粹的“社会自治”或“个体联合”,还是强调“国家权力培育基层社会”,都存在过度理想化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得现有的理论很难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进行有效解释。由于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趋势的推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再度经历着复杂的变迁,必须重新在一个相对实在的中观领域进行重新观察。社区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交叉的一个领域,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关 键 词: 社会分化; 意识形态; 多元主义; 社区建设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5.01.003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等讨论在学术界一度十分热烈,这些讨论背后秉持的信念在于国家应该从社会领域退场,为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释放自我生长的空间。但是,近二十年的实践表明,国家权力的退场并不意味着良性社会自治秩序的自我生长,反而出现了基层组织溃败和公共服务缺失的不利局面。为此,一些学者提出国家力量应该重新返回基层社会,重建公共服务和重整社会秩序。但是,从当今的客观现实来看,无论是突出一种排斥国家权力的纯粹的“社会自治”或“个体联合”,还是强调“国家权力培育基层社会”,都存在过度理想化的问题,因为在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得现有的理论很难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进行有效解释。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的立场,都需要重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现

实变化的基础之上。而在今天,由于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趋势的推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再度经历着复杂的变迁,必须在一个相对实在的中观领域进行重新观察。社区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交叉的一个领域,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一 历史与理论中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

法国学者贡斯当在《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一书中,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时代)并不存在个体性的自由权利,个人从属于城邦等政治实体,只有在政治活动中才有自由^①。这说明,个人自由权利观念的兴起是一个近代现象,同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过程相伴。

在观念史的叙述中,霍布斯的理论往往被视为推动个人与国家、社会分立的重要起点。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并非是“自然的”,

作者简介:殷树凤,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商业学校校长。(江苏南京,210029)

① [法]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3页。

而更多地体现为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理论镜像：秩序崩坏、战乱不断的社会。为了保护个体，必须依靠建构起一个政治国家来克服无序的社会竞争。这是霍布斯的基本立场。因此，在霍布斯眼中，个人是前提，国家是守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必要条件，而社会则是一个败坏的领域^①。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和拒斥，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所处时代欧洲世界战火不断的历史事实相关。到了洛克那里，自然状态的性质被重新定义，自然状态中最大的特点不再是人与人的“狼一般地相互争斗”，而是自然的丰裕：自然中存在着丰富的资源等待着人依靠劳动将其转化为财富。在洛克眼中，个人依然是前提，社会则成了人类追求成就的广阔领域，而国家则只是一种必要的恶。^②联系到洛克所属的时代背景，可以理解他的观念变化：英国的政治秩序已经渐趋稳定，大航海时代正在积蓄着惊人的力量，财富和自由不断激励着无数个人的行动——这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前夜。

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黑格尔则致力于以政治国家来克服市民社会的缺陷。洛克眼中充满希望的自然状态，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黑格尔口中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人自发行动的创造物，但这种市民社会本身存在着各种盲目性，依靠个体自私自利的逻辑来驱动。黑格尔对此十分不满，因为市民社会中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需要依靠政治国家方能实现。^③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个人精神的最终归宿，市民社会代表了一种较低层次的个人需求，但又不可能简单否弃。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力图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具有张力的平衡关系的做法，由于忽视了市民社会自身具有的政治性特征，所以必然导致失败，因为市民社会内部存在着各种具有政治实力的阶级实体，这些阶级实体可以利用、操纵政治国家，实现自身的私人利益。马克思希望依靠无产阶级来发动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超越政治革命，塑造一种更具公共性的共同体生活，个人自由也因此得到真正的实现。^④

理论和历史有复杂的相关性，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经历的19世纪，恰恰是资本主义不断胜利的时代。在短短百年时间里，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人类

社会的基本面貌，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重塑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资本的力量逐步摆脱把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编织在贸易的网络之中，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相对独立发展的局面，把不同的世界文明带入了同一个历史逻辑之中。传统纽带不断在市场和资本的扩张之下破裂：原本的家族、氏族、教会、行会、城邦、帝国纷纷解体或萎缩，从属于这些实体的成员们被解放出来，然后被卷入市场的复杂分工体系之中。在这个时代，国家的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型，多民族的帝国趋于解体，封建制的邦国也纷纷重组，新的民族国家逐渐从这些帝国和邦国的灰烬和残躯之中成长起来，成为新的历史主体。在民族国家的领域内，个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立的现象也日趋明显，资本以个人的自利为动机，而市民社会则成为资本自由扩张的活动领域，国家的角色一方面是充当起资本和市场的“守夜人”，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资本国际扩张的先锋和护卫。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常见的现象是个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而为了缓解这种内部压力，资本的对外扩张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边缘地区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以外部剥削来缓解内部剥削，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脆弱的平衡是难以持续的，所以相继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战的战火中，诞生了苏联，在二战之后，则出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预示着马克思、列宁等人设想的新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正式开始从理论进入实践阶段。然而，社会主义实践也面临着极大的难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外在压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往往需要同时肩负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多个环节的任务，这就形成国家过强，而个人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另一边，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中吸取经验，开始自我调整：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管制资本、限制资本的策略，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推进社会福利的普及。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政治国家，开始扮演起类似黑格尔预言的政治国家的角色，开始调节个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在二战后，西方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

① [英]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英] 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1页。

③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平稳发展期。

这都说明,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复杂演变之中,需要进行新的观察。

二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复杂变奏及其应对: 共同体思潮的复兴

20 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新的调整,例如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所主导的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这些改革,旨在降低国家的福利负担,将个人重新推向市场,这是一种对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的回归,从短期来讲,这种改革获得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衬托之下: 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丧失了政治实体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感召力也受到质疑。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多年的实践中,似乎也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来实现马克思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理想预言。因此,20 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扩张似乎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个体解放,提倡权利、限制权力,对原本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的知识界、媒体界、舆论界有较大的吸引力。自由主义者力图彻底废弃马克思等人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构想,将自由主义的构想作为一种普世的真理加以对待,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①

然而,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种“理想”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金融危机本身不是原因,而只是一系列矛盾的结果: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的普及极大的降低了人类的沟通成本和组织成本,使得个人可以从地域和时空的限制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实时互动,其意义不亚于工业革命时代市场扩张带来的个人从传统纽带中解放出来的意义。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颠覆了传统的空间意识——虚拟空间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也重塑着人们的情感、意识和行动模式。总体而言,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元: 一方面,从兴趣、意愿、需求出发,各种亚群体不断产生、发展,并且具备组织成员共同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际间的交流变成一种日常性的行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产生了

复杂的粘合,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个人和社会领域的这些复杂变化,国家的调整则相对滞后: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也迅速重组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一过程投射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层面,就突出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化不断加大和全球性的民众抗争运动此起彼伏。

时至今日,全球化的拓展却愈发将人类带入一种吊诡的局面之中,一方面,人们愈发呼吁政治自由、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私人生活领域,或是各种各样的小团体利益之中,忽视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这表明,新技术和新经济变革的发展虽然能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却不能自然而然地提供更好的分配模式和组织模式,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巨大鸿沟需要人的自觉行动来加以克服和平衡。总体而言,新技术和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导致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即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再度变得模糊起来——一方面,大量的新型企业,如苹果公司、谷歌公司等,在事实上已经具备了部分国家和政府的属性,也承担着相应的功能,掌握着巨大的权势,但却依然是以私人利益为行动标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愈加明显。另一方,国家为了回应民众诉求不得不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然而,官僚制的管制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激化出更多矛盾。^②

为了应对这种困境,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重建共同体”成为思想界普遍的理论诉求。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正是为了向社会重新注入公共性和政治性。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后期阶段,由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再度模糊起来,尤其是以新媒体和新的通讯方式的发展为代表,这些新趋势改变了人的交往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公共性愈发缺失。哈贝马斯力图以重建公共空间和公共政治平台来构建更大范围内的共同体——具有统一政治原则和公共利益的“欧洲共同体”。^③ 波考克等共和主义者,则提出以重新唤起人们自觉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方式,以新的政治行动来重塑个人,进而重塑社会、国家。^④ 而查尔斯·泰勒等社群主义者则力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② [德]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周涛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2 页。

③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6 页。

④ [英] J·G·A·波考克《马基雅维利的时刻》,冯克利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3 年,第 597 页。

图在发掘古希腊的城邦政治遗产的基础上,反思和批判个体优先的自由主义观念,强调共同体对于个人的必要性。^① 以上各种理论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化时代,强调个人至上的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依然无法应对新的现实问题,而全球化所带来的个人、社会和关系的重整,既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也与具体的地域和文化相关,需要从各自不同的现实出发加以进一步的认识,由此才能回答,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共同体。

三 中国社区建设的现实及其理论可能性: 探索新型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

在中国,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变迁,既受到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历史趋势的影响,又存在着内在的文化发展逻辑,呈现出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积聚的复杂面向。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了高效有力的国家组织,奠定了平等的价值观,但是,依然遗留了很多历史问题。中国也一度出现过类似于苏联的以国家取代社会、管制个人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体系逐步向社会让出空间,给予民众更多的经济自由,并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城镇里的企业、单位和农村中的村集体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从这些集体中走出的农民工、“下海者”、“个体户”等等,开始进入城市,在城市化的浪潮中,“社区建设”被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提上日程。从官方的立场看,“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在减少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调动不断生长的民间力量,将原有的城市街区改造、发展为具有一定自我组织功能和可以形成良性秩序的小型共同体,并且消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整体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在社区建设领域,国家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公共性资源的投入,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等领域,普遍存在着投入不足的情形,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政权“悬浮”社区之上,而社区被卷入市场经济的逻辑中,被资本的力量所支配,无法实现“共同体”的设想和职能。^②

进入21世纪,中国逐步形成了多元的社会利益主体,社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宗族等传统组织,在获得贸易财富支持之后,普遍出现了复兴的情形。通过激活家族、同乡等血缘、地缘组织要素,村庄和城镇中逐步生长出了具有“共同体”特征的社区空间。在江苏南部地区,原有的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的形式,村民实现了股民化,成为集体企业的共同所有者和受益者,以这些村办企业的收益为根基,类似于“华西村”等集体,事实上转变为了一种社区共同体。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中,由于产业集聚和城市开发而形成的工作社区和居住社区,也因为市民的中产化而获得了自我组织的动力和资源,通过日常性的志愿性活动和非日常的权利抗争性活动,社区成员逐步组织起来,社区的自我治理不再只是理论的想象。^③

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进一步改善这些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成为一个必须客观面对的理论难题。事实证明,宗族性组织的复兴可能伴随村庄与基层党政组织的矛盾,苏南集体经济模式也往往面临企业受益如何公平分配的难题,而城市中产的抗争运动则可能增加外来人口的城市化成本。因此,社区建设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作,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就必须先理解社区的独特性。而社区的独特性在于,它往往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兼具伦理性和政治性:正如前文所述,在古代,普通人的伦理生活与政治性生活尚未分立,都集中在类似于城邦、村社等范围有限社区空间之中。而到了近代以来,虽然传统社区不断瓦解,但新的社区空间也不断重新生成。大工业生产带来的物质生产形态革命极大的扩展了普通人的活动领域,使得公共政治生活超越出日常伦理生活的领域,组织起类似于民族国家这样的大规模的共同体,然而,由于个人身体和个人生命的有限性,虽然人们的观念和想象可以融入“想象的共同体”之中,但是日常性的生活仍然大多处于具体的社区空间之内。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虽然人们借由互联网、新型交通工具等工具超越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局限,获得一种虚拟性的“世界公民”体验,但是,人的身体的有限性并

① 伽·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② 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③ 周大鸣《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黄文虎《新苏南模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3-186页;雷骥,孙龙《权利、空间与公民社会——北京业主维权模式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不能被新的技术所超越,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必须存续于实在的社区之中。与家庭这种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不同,社区是最基础的公共生活的现实场域,社区之内不仅存在着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也存在着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等公共性内容,如卫生、教育、税收、社保等等事业;社区之内不仅存在市场、交易等商业性内容,也存在着社区公共财物管理分配、社区居民利益组织协调、社区与国家关系调整等等超越于商业性的伦理性和政治性内容^①。因此,社区建设绝不仅仅只是如何培育社区、发展社区、实现社区自治的问题,也涉及到社区与社区之间,社区与个人之间、社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交叉的现实维度。

如果要在社区建设领域探索新型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避免理论迷信,尤其是要避免过度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中某一个方面的思想倾向。现实的发展表明,个人、社会和国家都不应当被过度理想化,尤其对中国而言,虽然经历过国家过度膨胀的时代,但若因为如此而矫枉过正也并非明智的行为。国家的放权本身未必能带来社会的良性发展,尤其对社区建设而言,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这种投入往往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在现阶段,国家的投入和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要如何规范国家的行为。

其次,要注重新技术和新趋势带来的双面影响,避免激进的理论浪漫主义。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扩展社会的时空范围,虚拟的网络与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的结合,带来了人际网络的圈层化趋势,这种趋势虽然看似使个人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却也使得具备政治建构能力的实际交往行动萎缩,导致了一种“虚假的公共性”:个人接触到的巨量信息事实上都被个人的偏好所取舍,事关公共生活的重大议题得不到严肃应对。如果坚持以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其以个人权利和个人自主为出发点的原则,将使互联

网时代个人“封闭化”的倾向变得更为严重。面对这些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趋势,必须进行长期、细致的理论观察,探索驯化技术的方式,而非被技术所宰制。

最后,要对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保持警惕。市场经济遵循资本的逻辑,以交换为基本的行动模式,并对所有的商品进行定价。而共同体的特殊性正在于,共同体之间无论是遵循情感、政治还是伦理的逻辑,都在一定程度上拒斥将人际关系商品化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守护人的精神属性。然而,市场的力量又无法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还找不到更有效的经济组织模式。无法彻底否定市场,但却需要为市场划定边界。市场与社会的边界,需要在日常的实践中不断被加以探索。因此,如果将社区建设视为培育共同体、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模式,就必须避免把社区建设作为一种营利性的工程。

四 结语

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模式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农业社会封闭性的内部循环体系,继而重组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也瓦解了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使个体获得了解放。然而,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虽然能瓦解旧有秩序,但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建立更良好的新秩序,新的秩序需要人的能动性参与,就像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所揭示的那样。在大工业时代,依靠宪法和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可以通过政治权力规制社会资本的力量,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可以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到了全球化时代,新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模式造成的贫富分化、社会对立再度打破了这种相对平衡的关系,这意味着,需要创造新的能动性的政治过程重整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社区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作为培育日常化政治形态和重建政党社会基础的实践空间。

(责任编辑:李建华)

^①焦若水《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与社区综合发展模式探索》,《探索》2014年第4期。